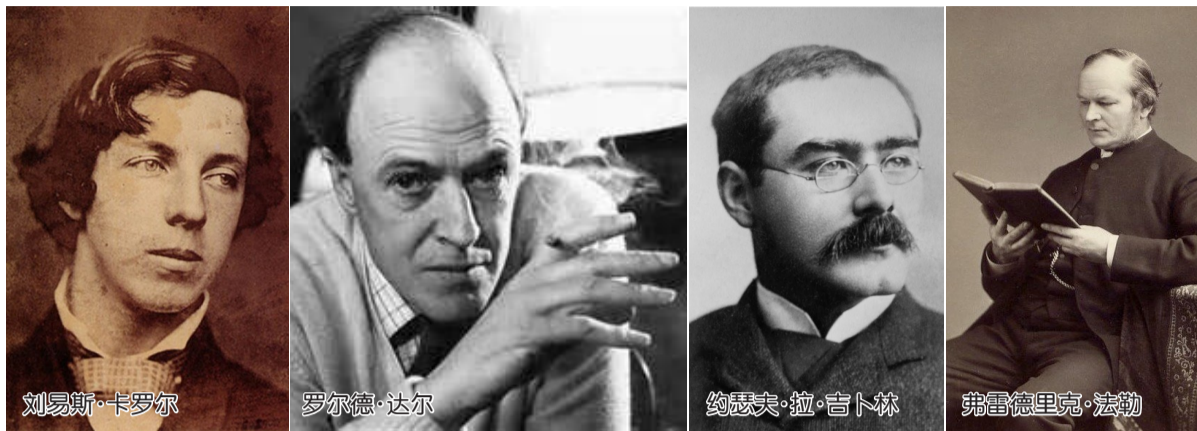


域外传真

# 英国儿童文学经典的世纪回眸

□舒 伟



刘易斯·卡罗尔 罗尔德·达尔 安东尼·布朗 弗雷德里克·法勒

## 儿童文学经典的形成

人类世界早已进入电子媒介和互联网时代,然而图书作为人类知识和文化的载体永远不会消失。对于少年儿童的成长进步,优秀儿童文学图书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1932年,法国和英国的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发表了关于现代儿童图书的经典论著。法国学者保·阿扎尔的《书,儿童与成人》是阐述早期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奠基之作。作者提出,成人应当努力让儿童拥有终身与书本相伴的习惯。儿童通过阅读成人作者创作的文学经典而获得心智滋润,能够在未来借助自由幻想的生命力而展翅翱翔。这是儿童文学经典能够给予儿童的智慧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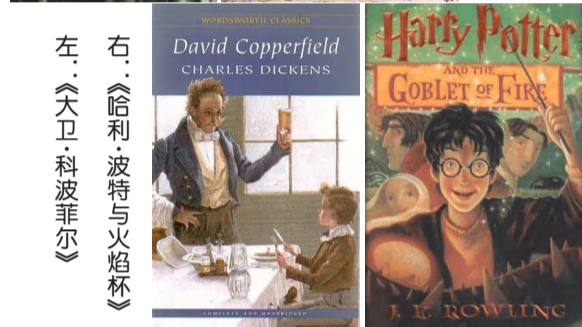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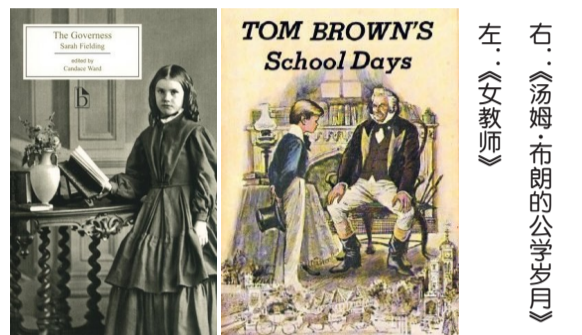
英国儿童图书出版史学者哈维·达顿的《英国儿童图书:5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同样初版于1932年,是一部论述英国儿童图书出版史的权威专著。它以具体翔实的史料和精到透彻的阐述使人们得以认识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及发展进程,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幻想文学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内在逻辑关联。此外,作者对童话文学及19世纪60年代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小说发表以来的儿童幻想小说做了专章阐述。

从18世纪40年代英国出版家约翰·纽伯瑞开始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到20世纪末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风靡全球,英国儿童文学的崛起和发展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1744年被看作历史上第一个自觉的自成体系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开端。纽伯瑞生前出版了20多种儿童图书,包括《少年绅士和小姐淑女的博物馆》《小人国》杂志、《精美袖珍小书》系列等等。这些读物大多追求文字生动,插图精美,注重知识价值以及阅读趣味。1815年,约翰·纽伯瑞及其继承人共出版了400多种为儿童及青少年读者创作和改编的读物。总体上看,纽伯瑞及其继承者的出版理念和图书内容还没有超越理性常识,恪守道德与宗教等教育主题,但强调必须包裹上“糖衣”,以愉悦而非刻板说教的方式表达。约翰·纽伯瑞使儿童图书从此成为图书出版行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幻想文学不仅开创了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而且形成了从19世纪后期的两部“爱丽丝”小说到20世纪末的“哈利·波特”系列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主潮。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克·齐普斯指出:尽管并非“哈利·波特”小说系列使儿童文学回归其在文化版图中的应有地位,但它们确实巩固了儿童文学在文化版图中的地位,而且将继续使普通读者认识到,儿童文学才是最受欢迎的流行文学。儿童文学是真正的民间文学,是为所有民众创作的文学,是无论老少都在阅读的文学,它对于儿童的社会化特别是发展孩子们的批判性和富有想象力的阅读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 两种童年叙事的文学经典

在哲学意义上,童年是生理的,更是心理的;是个体的,更是普遍的。在一般意义上,要认识童年,就要认识儿童的特殊生命状态和特殊精神世界。一方面,童年包容了



左:《女教师》 右:《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  
左:《大卫·科波菲尔》 右:《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太多的东西,出于好奇而渴望探索和历险的时期;另一方面,童年又是一个受到诸多限制甚至禁锢的时期,是一个渴望长大而逃离大人管制的时期。一方面,童年是无畏的,心比天高的;另一方面,童年又是摇摆不定的,甚至充满恐惧的;一方面,童年是童言无忌,天马行空的,充满想象的;另一方面,童年又是蒙昧无知的,正所谓“年幼无知”,需要成人的呵护和引领。作为童年和童年叙事的文学表达,儿童文学由此具有依托童年、超越童年的特殊双重性。

作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英国儿童文学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也形成了儿童文学的童年叙事经典。

查尔斯·狄更斯童年受到伤害的经历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他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捕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童年和人生,进行了苦难童年题材的书写。狄更斯是第一个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所讴歌的儿童形象转化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书写的主人公的杰出作家,呈现了令人难忘的童年群像——《奥利弗·特威斯特》(汉译为《雾都孤儿》)中的主人公奥利弗·特威斯特在济贫院里的一声哀求“先生,我想再要一点稀饭”让无数读者流下眼泪;《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斯迈克饱受校长奎尔斯一家人的欺凌和虐待;《老古玩店》中的主人公小耐尔与外祖父相依为命,她的不幸夭折让无数读者垂泪不已;《大卫·科波菲尔》中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奋斗历程和情感经历让人感动;《小杜丽》中的艾米·杜丽全家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监禁于监狱;《远大前程》中的孤儿皮普在环境的诱惑下丧失了淳朴天性,历经磨难后才开始新生活;《艰难时世》中,商人葛擂更的女儿在父亲“事实原则”和“实用原则”的管教下,走上了失败的人生道路……

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爱丽丝”小说是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通过童话叙事书写童年,

通过小女孩爱丽丝在奇境世界和镜中世界的经历,作者革命性地拓展了传统童话叙事的空间和容量,他在很大程度上从工业革命的变化中汲取了能量,并且通过童话叙事表达了时代充满矛盾的希望和恐惧,以及以象征形式表达的希望改进现实生活的美好愿望。正是童话叙事中开放性且充满哲思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学因素造就了两部“爱丽丝”小说奇妙的阐释性,它们能够激活人们的心智和想象,使之成为跨越儿童文学领域的言说不尽的经典文本和“阐释奇境”。

狄更斯浪漫现实主义的童年书写和卡罗尔用幻想文学的方式书写童年,是殊途同归的,是对于在动荡年代里逝去的以童年为象征的理想王国的追寻和挽留。

值得一提的是同时代达尔文的“自传式”童年叙事。达尔文的《自传》所描述的科学家童年,使童年成为投射信念、求知、希望、爱情和欲望的富有吸引力的新大陆。

从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维多利亚时代的爱丽丝到罗尔德·达尔笔下20世纪当代神童玛蒂尔达,童年对成人威权的反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童年的反抗与狂欢。达尔的儿童叙事呈现的是狂欢化的“童年的反抗”,具有更加激进和更加生活化、社会现实化的特征。达尔小说的背景几乎都设置在当代英国社会,作者呈现的都是现实主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无论是主人公的生存困境,还是坏心眼的成人对儿童的压制和迫害,等等,都具有写实的特点。就此而言,达尔基本上承袭了狄更斯式“苦难童年”的写实传统。不同的是,作者在写实性背景下采用了童话幻想艺术进行讲述,即通过写实主义的手法描写少年儿童与成人世界异乎寻常的对立和冲突。换言之,达尔将狄更斯“苦难童年”的写实传统与卡罗尔“奇思异想”的幻想因素融合,用极度夸张的方式叙述现实世界中的“童年的反抗与狂欢”。

## 成长故事:校园叙事经典

早期的英国校园小说或者说描写校园生活的小小说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家萨拉·菲尔丁的《女教师》,随后有哈里特·马蒂诺的《科洛弗顿的男孩们》等作品问世。查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合写的《莱西丝特夫人的学校》是描写学校故事的短篇小说集,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等已出现对英国学校状况和校园生活的细致描写,这些描写也引发了社会对学校教育状况的关注。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进入快速发展和繁荣的时期,民众的收入相对提高,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父母为了让家中男孩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将他们送进寄宿学校。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公立学校数量激增,学校的教育实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宗教精神仍然是重点,而体育运动的设立和对体育精神的培养成为新亮点。1870年通过的教育法案表明要为所有人提供初级教育,客观上增加了英国校园小说的潜在读者数量。

英国校园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影响至深的经典文本,重要的作家作品有托马斯·休斯和他的《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弗雷德里克·法勒和他的《埃瑞克:一个发生在罗斯林公学的故事》、塔尔博特·里德和他的《圣·多米尼克学校的五年级》、约瑟夫·拉·吉卜林和他的《史托基和他的伙伴们》。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年校园小说到20世纪罗琳的“哈利·波特”小说,英国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继往开来的校园叙事经典。从托马斯·休斯笔下的汤姆·布朗到J.K.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英国校园小说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前者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后者是幻想故事,但都是关于从年幼无知走向身体和心智成熟的成长叙事,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文学艺术载体而已。从汤姆·布朗到哈利·波特,男孩主人公通过不同方式享受着富于想象力的校园历险行动,故事的场景就设置在熟悉的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和运动场。同样,现实生活中的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都是引导主人公成长的良师益友,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主人公克服挫折,经受各种考验,最终认识了人生和社会,从幼稚走向成熟。

樊发稼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独一无二。他沮丧的时候,像秋天被霜打过的小草一样;他兴奋的时候,像是高山顶上的旗帜一样猎猎飘扬;他皱眉的时候,额头上就像有一座山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他讲话激动的时候,中气十足,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多愁善感,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四季分明。

“我是个诗人。”他喜欢强调这个身份。他写过不少寓言,童话,更多的是评论,但他很少去强调诗人的身份。诗歌是他最钟情的文体,最能充分地表达情感,最能痛快淋漓地展示他的天性。在很多文学会议和作家作品研讨会上,他的这种强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他的发言就展示了他的诗人气质和磅礴的诗人激情。

樊发稼的坦诚、热情、直率是少有的。他是那种旗帜鲜明的人,坚定的人。肯定或者否定,总有点义无反顾的意思。他不懂得矜持和圆通,更有童心的品质。对他的发言和举动,人们会报以善意和欣赏的微笑。在审视这些微笑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这种会心的微笑之中,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的嘲笑成分。很多年,他都像一个斗士,一个全副武装的斗士一样,为儿童文学事业鼓与呼。他扶持过很多新人、年轻人,我就是受过他恩泽的人之一。

他最早是学俄语的,但他像大多数早期的文学青年一样,对写作和文学抱有浓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后来发展成理想和事业,也改变了他的职业和人生的方向。人生的选择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假如他选择继续在大部委工作的话,当个处长局长是不在话下的,而那唯一的好处只是可能比现在生活得舒适些,生活条件优越些。问他是否后悔,他总是微笑,淡然地说:“我相信命运。”他相信命运的安排,命运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毫无疑问,文学既耗费了他大半生的心血,也给了他满足感和成就感,他对文学的爱,不掺一点虚假的成分。

樊发稼虽然是一个评论家,但他的思维很活跃,也很跳跃。他偶尔给你丢下几句话,会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当你沉思默想那么一分钟,就会哑然失笑,其实原因很简单。记得一个深夜,我们从外地参加完研讨会回京,在机场,我打出租车送他,他执意不肯,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正内心忐忑不安,他突然转过身,用高八度的声音,愤怒而又批评的口气说:“武林,我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的消费观念不能与你们这代人苟同!”说完,大步流星走了。我一时还不明白什么事情让老人家大光其火,愣了两三分钟才回过神来。这大概是他诗人和批评家混合思维最典型的例子了。他是一个缺乏隐忍能力的人,心中的快乐和不快总要倾吐出来。率性而为,但又会懊悔不迭。在别人看来这有点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的意思,但我却觉得这是他对两种思维平衡和审视的结果。

樊发稼是一个很朴素的人,性格和穿着都很朴素。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不合时宜的,尤其在消费的年代,一个人的地位才华身份都写在衣着上,但他很固执,从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他是一个优良传统的捍卫者,简朴的生活态度和消费观念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这也是他待人的态度。在生活中,他不以长者自居,也不以前辈自矜,能不麻烦别人就不给别人添麻烦,能亲历亲为就去身体力行。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京办事,他陪着我一一走访许多前辈。那份热忱,那份慷慨,那份大度,石头都能被融化。当他骑着三轮车把一箱白酒送到我爱人单位的时候,我爱人诚恳地说都有了罪恶感。他不喝白酒,要送给我,我让我爱人去取他执意不肯。我都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人的一生能有几次被感动得想哭的遭遇?

樊发稼是一个主流的批评家,诗人。作品都很阳光,铿锵有力,传递给人的是真善美的东西。他做人也阳光,很多年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他发信表示祝贺,他说:“武林,你现在的国家队中的一员了,加油!”他很珍惜荣誉,在他的意识之中,是看不到颓废消极的东西的,这种意识形态几乎主导了他的全部生活和全部事业。这样的人是乐意奉献的,愿意燃烧的,说到底,他的坦率、真诚、透明,是童心闪烁的缘故。他会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和对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判断。在很多场合的发言中,他用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口气,来捍卫自己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当他意识到自己过分武断的时候,他会很歉然地笑笑。其实,很多东西是不用解释的,越解释越乱。我们如果读懂他的笑,就会明白他已经在纠正自己的过激了。

进入古稀之年之后,他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疾病、精力、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让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助。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说:“我老了。”这种悲秋之声,倒是一份难得的清醒。他一生没有学会的东西就是掩饰、矜持、故作姿态。也许,他会感到一丝的惶惑,自己究竟要给这个世界——尤其是文学世界——留下什么?在我看来,他的诗歌、寓言、散文是会有一些佳作流传下去的。我相信,他这个人就是最成功的一部作品。

多愁善感的诗人  
□安武林

短评

刘耀辉《布伦迪巴》:

## 以凄美的童话承担历史之重

□徐 妍

童话在儿童文学家族中属于难度最高的文体,其写作难度堪比短篇小说,优质童话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童话王国有自己的立法原则:以童话的方式再造第二世界,包括对儿童性的再造。但这并不是说童话可以拒绝承担文学的要义,比如:对历史伤痛的反思、对人性之恶的触碰。在此意义上,刘耀辉的长篇童话《布伦迪巴》满足了我对近年来中国童话的某种期待。

据刘耀辉在附记中所述:《布伦迪巴》的问世源自工作、使命、天意,对他而言是对自身极限的挑战。他需要以世界性的目光回返到特莱津这个“二战”期间犹太人集中营的历史现场,试图在童话中注入历史元素,这就意味着他在创作时,无法绕开这样的追问:童话可以讲述历史吗?童话如何讲述历史?这也正是长篇童话《布伦迪巴》的特别之处:在历史伤痛的视角下将童真之美与人性之恶对照起来,以承担童话的历史使命。《布伦迪巴》不只是描摹童话般的梦境,而是借助梦境展现残酷的历史记忆和斑驳的人性投影。凄美的奇境、沉重的历史伤痛、悲悯的情怀构成了《布伦迪巴》的特有标识。

刘耀辉为读者精心营造了意味深长的凄美奇境世界。捷克小镇波西米亚(隐喻“二战”期间被“纳粹”当作犹太人死亡“中转站”的捷克小镇特莱津)附近的小乡村住着一个贫穷但幸福的家庭:妈妈和一对小兄妹派柴克和阿宁库。妈妈患了重病,为了获取挽救妈妈生命的鲜牛奶,小兄妹徒步来到小镇。在中心广场遭遇了恶霸布伦迪巴。随后作者展开了童话最好看和最惊险的情节:小兄妹在金大钟先生、蓝拱窗小姐、大黄狗、老白猫、小麻雀等的帮助下,再

联合300个小学生,终于打败了布伦迪巴并得到了鲜牛奶。作品所包含的关于孩子救母的内容与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新奇,但它建立了一个异常凄美的奇境世界,以唯美的语言来表现恶撕裂善时的悲情色调。尽管不乏善战胜恶的明快描写,但悲剧性要素反复出现并生成了凄美的总体叙事基调,这些悲剧性要素被处理为对童话的悲剧性美学精神的节制表达。整个童话调动了诸多奇境要素,构成了一个似真似幻的神奇世界。

但是,《布伦迪巴》真正依赖的是“危机四伏的奇幻世界本身”,以及危机四伏的读者内心世界。如果读者是细心人,会发现《布伦迪巴》多次或明或暗地描写了鸦群的踪迹,带给人不祥之感。小兄妹遇见的瘦弱男孩儿希姆尔从哪里来,回哪儿去?这样的疑问也会让人不寒而栗。再加上欺软怕硬的警长、“没有钱就没有牛奶”的冷漠牛奶商、不辨是非的成人,更使童话始终笼罩在“危机四伏”的氛围中。真正的童话从来都不是剥离现实、祛除历史的。我们在童话中看到听到的,都是童话与现实和历史保持某种隐秘关联的特有方式。经由此种隐秘关联,童话才有可能走进人心。我以为,《布伦迪巴》中的奇境世界之所以“危机四伏”,正是因为它与现实世界中人们对历史记忆的遗忘、以及历史伤痛性记忆不应被遗忘保持着隐秘关联。通过这种隐秘关联的修复,读者被伤痛性历史记忆沉重一击且深深反思: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历史世界,乃至未来世界,恶霸布伦迪巴并未彻底消失,联想到近年来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美俄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日本安倍政府意欲强行修宪等事件,布伦迪巴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对于它

的丰富内涵,读者需要反复阅读才可以领略。

只是,试图在童话中注入沉重历史记忆的表现方式是一种高风险的写作。创作者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偏离童话的创作原则——一般意义上的童话委实不堪承受历史之重负,但《布伦迪巴》始终被悲悯情怀所浸润。不过,刘耀辉并未因悲悯情怀而违背童话的创作原则。在正文部分,历史记忆或被处理为童话的氛围描写,或被处理为奇境世界的幕布。在正文之外,作者还增加了童话的附记部分,将正文中欲言又止的话语,通过附记一吐为快,构成独立的有历史感的完整童话世界。童话正文是对历史的诗性表现,童话附记是对历史的理性反思。而历史与童话之间的一体关系,归根结底源自刘耀辉的文学观念:历史感的传达,同样是“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借助于附记,读者得知:这部童话是专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而作。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无论哪位作家、选取哪种文学体裁,都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如何在历史黑洞的探勘中绝境逢生?这是比历史童话写作更为冒险的事情,何况,刘耀辉还打通了诸多历史黑洞。他以《布伦迪巴》为中心,延展开去,对儿童视角下“二战”题材的小说史和电影史做了梳理。所以,童话附记除了是刘耀辉一个人的灵魂受难史,还是《布伦迪巴》创作者们的灵魂受难史。

“吾诗已成,不可毁灭。”这是刘耀辉为全书作结的最后一句,可以理解为一位中国青年作家对历史伤痛性记忆的铭记。特别是在历史记忆被日渐遗忘的浅阅读时代,这样的声音何其寂寞和孤独,又何其需要倾听和记取。

封面欣赏



《柳哑子》 刘耀辉著 2009年1月 天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81期

儿童文学评论  
水心